

使秦、挾秦與刺秦——從 1942 年 「易水送別圖題詠」論汪精衛晚年的烈士情結**

劉 威 志*

摘 要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從汪文人龍榆生、李宣侗等人於 1942 年初，假題詠「易水送別」為名，向汪精衛的對日政策婉曲進諫，他們各負常州詞派、同光體等學問基底，與當時的歷史氛圍相激盪，對荊軻故事展現獨特的觀照。本文取汪精衛政權文人「『易水送別圖』題詠」為研究核心，探討汪等人如何透過此組文本，詮釋荊軻故事、汪精衛庚戌行刺事（1910）與此際「和平運動」三者間的錯綜關係。冀能一窺汪精衛及從汪文人詩詞中的典故挪用、政治謀略與情意寄託，勾勒汪等的意圖與心事。

當偽政權中人以詩言志，心畫心聲是否仍然失真？當一戰以來詭譎多變的國際形勢，與夷夏不兩立的民族主義論述詰抗抵牾時，汪等的「和平運動」如何藉由常派「寄託說」自解自辯？偽政權核心中人的傳統文學成就與情感脈絡多受文學研究者的諱言與忽略，筆者望能藉由揭舉該特殊氛圍下的文學表現與風格，從而使學界重新評估汪政權文人詩詞作品價值。

關鍵詞：汪精衛、龍榆生、同聲月刊、抗戰、荊軻

2013 年 5 月 2 日收稿，2014 年 2 月 6 日修訂完成，2014 年 7 月 24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 謹此感謝三位匿名評審專家惠賜犀照之見。本文撰寫期間，承祝師平次、郭黛暎學妹、熊燁學兄、潘益民老師、黃自進老師、微塵草芥先生賜示批評；並感謝美國 Grinnell 學院歷史系退休教授謝正光老師為拙文易筋通脈，筆者獲益深重，特誌此以示不忘。

一、前言：烈士的情結

1944 年冬，汪精衛（兆銘，1883-1944）以多發性脊椎腫瘤，病歿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消息傳至美國，在哈佛講學的胡適於日記裡寫下：

同日（1944 年 11 月 13 日），日本宣佈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裡。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 complex。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且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另外一件事。比如酷吏自誇不要錢，就不會做錯事，不知不要錢與做錯事是兩件不相干的事呵。¹

胡適所謂「烈士出身」即汪精衛於清宣統元年（歲在庚戌，1910）行刺清廷攝政王事；而「主張的是與非」與「不要錢與做錯事」，指的是汪精衛在抗戰中途離渝赴越南（1938），發表艷電，響應「近衛聲明」，主張對日謀和，最終成立南京國民政府（號曰「國民政府還都」，史稱「汪政權（1940-1945）」）。

胡適並舉汪氏「得名之始」與「名毀一旦」二事，俱以「烈士的 complex」（而非「漢奸」）形容，可見汪氏當時自期以「跳火坑」之心情與日謀和，已受到知識分子如胡適者某種程度的同情與理解。

汪榮祖曾舉汪精衛 1939 年作於越南河內往上海舟中的〈不寐〉詩為例，分析汪精衛與日謀和的心情、信念及決心，並主張這與汪少年時行刺攝政王之志意並無二致。他認為汪氏性情已充分流露在其詩篇，如能深入研究汪氏詩詞，定有助於瞭解當日汪精衛面臨抉擇的掙扎與堅持，「否則一聲漢奸足以蓋棺論定，然於知人識事，失之多矣。」² 葉嘉瑩則引申「烈士的 complex」之義，用詮汪精衛《雙照樓詩詞稿》。她舉辛棄疾詩詞中的執著為對照，認為汪氏整部詩詞貫串著一種願意犧牲自己去完成什麼的信念；³ 近來，葉先生復撰文深詮汪精衛〈憶舊遊〉一闕，並結合所倡「詞之美感特質」為說，認

1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第 8 冊，頁 200。

2 汪榮祖，〈良友漸隨千劫盡：從詩情看汪精衛投敵〉，《詩情史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頁 297。

3 葉嘉瑩主講，汪夢川整理，〈汪精衛詩詞中的「精衛情結」〉，《印刻文學生活》5.7（2009.3）：104-117。

爲「汪氏晚年在成立偽政府的前後……確實寫出不少具有詞之特美的『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的佳作。」⁴

汪、葉兩先生都從汪的詩詞切入。前者認爲研究汪之詩詞，正所以理解身居黨國要位的汪精衛在抗戰中選擇與日謀和的決定與心情。後者則優許汪精衛詩詞的高度藝術性，尤致意其晚年作品。兩位先生對汪氏詩詞在歷史與文學上價值的肯定，提供了一條研究汪政權、評價汪精衛詩詞的新方向。職是之故，本文舉胡適所謂「烈士的 complex」爲引，並依汪、葉二先生所提出的研究視角，以太平洋戰爭爆發（1941年12月8日）後約二個月的時間（1942年2月14日以前），汪精衛暨從汪文人題詠「易水送別圖」之詩詞爲主要研究對象；並援諸人自汪政權成立後即著手纂修序跋之《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系列叢書爲輔助分析文本，冀能以此二者，理解汪及從汪文人於是情是境之主張與詩藝，從文學語境與時空背景的互文中，探尋當時的歷史面向，企圖呈顯汪氏晚年烈士情結的發展。

二、汪精衛刺客 / 烈士形象的本事與建構

本節將把梳汪精衛被目爲刺客、烈士之事件，與從汪文人對汪形象之建構。茲先敘述汪精衛庚戌行刺（1910）本末，並略論學界對汪之行動、思想與當時風氣、時局的研究成果；次以張江裁所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相關叢書爲中心，探究張江裁自1940年移居南京、身與汪政權後，如何在汪政權尋找要人爲該叢書作序，並受到汪政府的資助與出版，儼然政府宣傳物之過程。

（一）庚戌行刺滿清攝政王（1910）

有清末造，當局懼於八國聯軍之入侵，既欲平撫士怨民怒，又以示開明於國際，遂在光緒三十三年（1906）下詔預備立憲。宣統元年（1909）各省

4 葉嘉瑩，〈說汪精衛晚年詞作中的感情心態，兼論詞體之美感特質——從汪精衛一首〈憶舊遊〉詞談起〉，《印刻文學生活》9.2(2012.10): 127。「詞之美感特質」，見葉嘉瑩，〈從艷詞發展之歷史看朱彝尊愛情詞之美學特質〉，葉嘉瑩、陳邦炎著，《清詞名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1996），頁155-156。

舉行諮議局選舉，是為「立憲運動」。前此，同盟會之革命幾經清廷嚴剿，犧牲慘重，更兼懷柔民心的立憲運動，同盟會最大的支持方——海外華僑，亦悻悻然有姑待時變之意，甚且《民報》內閣，主筆大將章炳麟出走，同盟會內，士氣低靡，眾人懷抱訕訕，志沮意頹。⁵

當此之際，曾任《民報》主筆的汪兆銘，思行刺滿清最高職權者，用破清廷立憲之局，兼以團結黨人、振奮視聽。胡漢民、朱執信等苦止不聽，汪密於宣統二年（歲在庚戌，1910）組七人暗殺團，⁶將以炸藥謀刺攝政王載灃於北京銀錠橋。

不幸事洩，汪精衛、黃復生遭拘，汪賦「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慷慨入獄，更兼洋洋五千餘字〈被逮口供〉，痛陳立憲之絕不可恃而革命之終不可遏，震驚朝野，一時傳鈔。汪本為《民報》健筆，其演講丰采，據聞亦甚奪目；故被捕受審時賦詩作文之舉，不啻又一次革命宣傳。

於是，清廷畏於輿論，復欲收買人心，遲未殺汪；是年年底，孫文、黃興等召集同盟會精英，與清廷決一死戰，即隔年三二九黃花崗之役。⁷十月，武昌義旗再舉，清帝遜位，中華民國誕生。

日人譽汪精衛為「革命的風雲兒」，這與汪少年時代慷慨赴死，暨民國成立後毅然捨粵督職位、逕赴法國留學的清新形象不能無關，甚者，許育銘的研究指出，汪精衛的人格形象自始至終，就是汪賴以活躍於政壇的最重要資本，因為汪除了孫文繼承人此一身分外，並無任何嫡系的軍隊或財閥為背景，「全憑革命過程內樹立之形象典範與行事風格」，向與其他以軍閥、舊文官體系出身而掌政者大相逕庭。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民族主義的仇日氛圍更加高漲，凡與日協調、妥協者，都得承受漢奸的罵名。許育銘認為，汪於第二次蔣汪合作期間（1932- 1935）任行政院院長，負責與日本斡旋，拖遲中日戰爭之

5 汪兆銘留日時期的思想、主筆《民報》、投身革命的事蹟，可參許育銘，〈汪兆銘革命生涯的崛起〉，《東華人文學報》3(2001.7): 323-346。(日)伊原澤周，〈留日期中的汪精衛及其革命思想〉，《從「筆談外交」到「以史為鑑」——中日近代關係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375-378。

6 計有黃復生、黎仲實、喻培倫、曾醒、方君瑛、陳璧君。

7 許育銘，〈汪兆銘革命生涯的崛起〉，頁 334。

爆發，為貫徹國府「先安內後攘外」政策，正逐漸消耗自己的政治資本。⁸

總而言之，清末以降，汪精衛因刺客、烈士行為得到的聲名，於抗戰前，就有逐漸崩毀之勢，最後滾滾罵名、排山倒海而至的關鍵，即在 1940 年於南京成立汪政權，推動「和平運動」之時。然而，從汪諸人，卻直以此為重任、為要務，甚者重新梳理汪精衛少年時的形象與精神，與此際「和平運動」作連結，建構另一種犧牲與刺客的烈士圖景。

（二）纂輯《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相關系列叢書（1940-1943）⁹

汪精衛與從汪文人對《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相關系列叢書之編纂與序跋題詠，可視作諸人援引汪之光榮歷史，為「和平運動」宣揚合理性，同時尋找同情與背書。此現象至少代表他們努力塑造自我形象，並對「和平運動」有所認同。

這系列叢書的編纂暨相關文化活動，計自 1940 年年中到 1943 年年初，約三年時間，內容有題詠、序跋、唱和、編印，事件環扣，充滿了各類再創作文本與詮釋。汪政權要員或重要文人周佛海、任援道、林柏生、趙尊嶽、李宣倜、樊仲雲、龍榆生、周作人、梁鴻志、王揖唐等，都參與序跋或題詠。計得書七種，而若以諸書之序跋作統計，更有近二十篇。以參與人眾、稍涉複雜故，以下暫依時間先後，分析事件、成書經過、題跋之作者、作期，並其他關聯事件。

宣統二年庚戌（1910），汪精衛行刺清廷攝政王未果，繫於獄。是時掌刑部簿錄者張篁溪，乃汪精衛留日時法政速成科之同學。汪釋後，篁溪於民國元年（1912）編有《汪兆銘庚戌被逮供詞》（1912 年 3 月 29 日）。¹⁰ 是年四月中旬，汪與孫中山、胡漢民等人遊武昌，汪出示獄中〈夢友〉一律，眾人唱和，文獻載有四首，此為「汪精衛庚戌蒙難」最早的和詩紀錄；諸人和詩不脫歌詠刺客死志與壯士生還，未見優於歷來諸家之詠刺客。¹¹

8 同上註，頁 324、325。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臺北：國史館，1999），頁 395-396。

9 率此序跋題詠諸製，寄意雜而深蘊多，筆者將另撰專文探討。

10 張篁溪編，《汪兆銘庚戌被逮供詞》（《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 58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3），頁 501-505。

11 張江裁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瑣記〉，收於氏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中

民國二十四年（1935），張篁溪之子張江裁應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會招，纂北平坊巷新志；二十六年，以纂《中華民國開國史》故，先輯成《汪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弁諸書首，並有楊圻、江亢虎二序，期間，張江裁亦致書汪精衛索序，未得應。¹²以上皆為汪政權成立以前事。

汪政權成立後，張江裁寓居南京（1940），任汪政府國史編纂委員會簡任編修。1940年五月底，張江裁重輯《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封首周作人題字，前有汪精衛、王揖唐二序。並有題詞數首。¹³其中，汪〈序〉作於元月，是時汪政權尚在籌備階段，並觀前此汪不願為序而此際終於作序之原因，可度其自白之心。是年十二月，張江裁續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別錄》，前有汪精衛校記六條，末署「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三日是晨謁國父孫先生陵墓，夜就燈下，泚筆作此」，¹⁴另共得王揖唐、趙尊嶽、龍沐勛、樊仲雲、胡澤吾五序，後有張江裁自作識語。諸序作期，蓋在《中日基本關係條約》談妥而預備簽約前後。¹⁵該條約可見日方強取豪奪之心，既與1938年日相近衛聲明不符，比之1939年《中日新關係調整綱要》亦甚過之，從汪諸人意頗快快。

民國三十年（1941）九月，張江裁編成《袁督師遺稿遺事彙輯》，汪精衛序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讀之不暇為袁督師悲，而為中國悲也」（1941年春），¹⁶蓋汪等人以明將袁崇煥自擬自傷也。

民國三十一年，龍榆生主編之《同聲月刊》第2卷第2號載有龍榆生〈水

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85冊），頁527-528。

12 汪精衛〈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別錄序〉云：「（張江裁）並以暇日所輯庚戌三月間余入獄始末見示……自以為國戮力三十餘年，而成效未見，災難且洊至。深以不獲早死為恨，故於次溪所序，遲遲未有以應也。」知抗戰前張已求序於汪，而汪直待成立南京政權後，方應而作序。見張江裁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別錄》（《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85冊），頁530-531。

13 張江裁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頁507-528。

14 汪精衛，〈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別錄序〉，張江裁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別錄》，頁530-531。

15 是年八月底談妥，十一月三十日簽約。蔡德金，《汪精衛生平紀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頁298-305。

16 張江裁纂輯，《袁督師遺稿遺事彙輯》（《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24冊），頁350。

龍吟爲豁龔上將題高奇虹畫「易水送別圖」、李宣倜〈滿江紅題「易水送別圖」〉、梁鴻志〈爲援道題「易水送別圖」〉、汪精衛〈豁龔出示「易水送別圖」〉，中有予舊日題字，並有榆生、釋戡兩詞家新作，把覽之餘，萬感交集，率題長句二首、李宣倜〈次均精衛先生題「易水送別圖」二首〉。¹⁷ 次月《同聲》，龍榆生以「鍾山隱七郎」爲筆名，囊衆詩詞而踵益之，衍爲〈易水送別〉歷史歌劇。¹⁸ 蓋隱括汪精衛庚戌行刺與此際情境於荊軻故事。

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張江裁《汪精衛先生年譜》出版，有趙尊嶽、吳廷燮二序、廖恩燾七律二首、張江裁自識語。同月，編成《汪精衛先生著述年表》，得錢仲聯、趙尊嶽二序。¹⁹

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以後，「中華民國史料編刊會」合前此諸書，勒作《汪精衛先生行實錄》，²⁰ 卷首李宣倜、周佛海題字，增弁周佛海、林柏生、李宣倜三序。

張江裁於不到三年時間內，編印書籍六種有餘，乃作意爲之。而汪等在千夫所指的時間點序跋、出版諸書，爲汪人格宣傳之際，不免也有爲己自清的企圖，可見在聲名與和平理念追求中，帶有重重焦慮。回到 1910 年庚戌蒙難的本質思考，那是一次犧牲自我的刺客行爲與烈士心忱殆無疑義；而從汪文人於 1940 年代起，有系統地對庚戌蒙難歌詠、序跋、宣傳，仿若將和平運動所爲比附於庚戌年行刺事件；探究諸人連結烈士與刺客，爲自我行動合理化的詮說角度，正是一條理解汪精衛暨從汪諸人當時心境的重要道路。

所以，當 1942 年以荊軻故事爲主軸的「『易水送別圖』題詠」這組同時連及刺客與烈士二者的文本出現時，則令人不得不滋惑生疑。固然，荊軻故事與汪精衛庚戌行刺的經歷相似，也與胡適所謂「烈士的 complex」若合符節；然而，果如汪等所喻，在倡言「和平」的今日，刺客將刺何人？且今日之燕秦趙魏分喻何國？今日之犧牲（如果也有犧牲的話），又將殉何國、報何

17 龍沐勛編，《同聲月刊》2.2(1942.2): 135-151。

18 龍沐勛編，《同聲月刊》2.3(1942.3): 91-106。

19 張江裁編，《汪精衛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99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頁 665-684。張江裁編，《汪精衛先生著述年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99 冊），頁 683-720。

20 張江裁總纂，《汪精衛先生行實錄》（《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 85 冊），頁 545-593。

主？再者，諸人挪彼喻此，真可爲此際汪精衛建構形象嗎？爲有效探本尋源，進入汪等「易水送別圖」題詠相關文本之前，將先篩理歷代文人對荊軻故事接受的重要典型，冀此析釐汪等所詠之沿革、創發與寄意所在。

三、兩種荊軻故事接受的典型及其內蘊

自司馬遷爲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立〈刺客列傳〉，後來正史，再無此體。惟評說、歌詠其事者不絕於冊，且致意荊軻者尤多，蓋軻傳爲《史記》壓軸，故史遷予以最完整的篇幅、生動緊張的描寫也。

就筆者所見，歷代文人歌詠荊軻可分兩典型，而此兩種典型又互爲對立。第一種即如隱逸詩人之宗陶潛〈詠荊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饑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²¹

陶詩已概括出後人閱讀荊軻傳的感想：荊軻之行乃是「君子死知己」的自我犧牲；而「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的易水送別是自知必死，仍勇往直前；最後以不講劍術而坐敗。歌詠荊軻之壯烈，歎息荊軻的犧牲，純以情感發展脈絡看待荊軻故事的態度，是詠荊軻的重要典型之一。

但以此情感歌詠，不能不說是司馬遷精心地布局、結構與引誘所致，遂使讀者聚焦於千鈞一髮的秦庭，渾忘宏觀看待荊軻事件與當時諸國形勢之關係。鑒於此，宋人則不以情感發展爲主線，而採取綜覽全域的視角，此即爲詠荊軻的第二種典型，如蘇軾〈和陶詠荊軻〉云：

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功成志自滿，積惡如陵京。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沙丘一狼狽，笑落冠與纓。太子不少忍，顧非萬人英。魏韓裂智伯，肘足本無聲。胡爲棄成謀，托國此狂生。

21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4，頁388。

荆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燕趙多奇士，惜哉亦虛名。殺父囚其母，此豈容天庭。亡秦只三戶，況我數十城。漸離雖不傷，陸戟加周營。至今天下人，憫燕欲其成。廢書一太息，可見千古情。²²

東坡與淵明唱反調，認為秦固積惡，惟「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太子丹與荆卿借箸劃策的刺秦之計，只是不能忍與不知天命的衝動，而後人所以「憫燕欲其成」，也不過是假嫉惡之激情，出諸馮河之手段。以謀國劃策論，不過泛泛。與此同時，東坡胞弟蘇轍，則更全面地批評〈刺客列傳〉，其中，似乎透露出東坡等宋人對〈刺客列傳〉不滿的因素：

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誇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繫蔡公；孫翩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讎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²³

子由著眼於兩點，其一是君臣倫理，其二乃外交常規。小人犯上，法不可長也；盟會之際詭出脅詐手段，更開後世惡例。所以，《困學紀聞》錄唐仲友（說齋，1136-1188）之言，則更引申轍義，他說：

諸侯棄甲兵之讎，為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養而親刺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老母之年，遂殺身以為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²⁴

五名刺客中有四名是賊禮、賊義、賊仁、賊信者，可謂大翻案。細思蘇家兄

22 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第7冊，卷40，頁2185-2187。

23 宋·蘇轍，《古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7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59，頁648。

24 宋·王應麟著，清·翁元圻等注，樂保群等校點，《困學紀聞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冊，卷11，頁1375。

弟與唐氏非難荊軻諸人之舉賊仁害義、自取敗亡的內在理路，乃倫理制度與君臣關係梯疊的邏輯。雖然他們都明白眾人「至今天下人，憫燕欲其成」、「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的心理，但站在為國家／帝國立萬世「道德法規」的憂慮中，仍不惜對荊軻諸人筆伐，此正見後代正史所以再無刺客列傳之因，而宋人此派批評，後來儼成與陶詩論點相爭持、相輝映的主流。

但是，以上兩派批評角度，實有再次辨析的必要。首先，陶詩中荊卿渡易而自必死的論點，即有瑕疵。燕太子丹曾語荊軻：「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縱，其破秦必矣」，知荊軻的計畫有順序地分為 A、B 兩部分。A 計畫，乃與〈刺客列傳〉之〈曹沫傳〉同，生劫秦王，逼得約契，此為正常外交過程中的非常作法，惟仍是可以公諸於世者，而且如果成功，荊軻諸人以燕國外交使節故，未必即死，如藺相如完璧歸趙、曹沫逼齊桓歸還所侵魯地，皆是前例。B 計畫，刺殺秦王，使秦失主，斯時在外征伐之將領，無中樞節制卻又手握大軍，則秦國內外相忌，可致混亂。惟此計一出，荊軻等人必死無生矣。

故陶詩以「易水送別」乃荊卿自料必死而仍勇往之觀點，只是以後見之明論斷荊軻。想易水送別之際，曹沫之事前在，況今「秦王貪」，或懼死，此事成功失敗與否，尚多變數，荊軻等人未許自認無生。陶詩一系的批評脈絡，僅以「勇於犧牲生命」詮釋荊卿渡易時的心情，似是文人天真單純的想像。²⁵

其次，針對宋人批評荊軻的論點而言，宋人有意忽略秦強燕弱的事實，只注重道德與政治位階，直把史書看作教科書，把歷史寫成當代史，全不為燕太子丹諸人想。且仍以後見之明——天命所之、暴秦必滅，作為最後的安慰。其實，荊軻的外交策略，前有成例，而國之將亡，出以非常手段，作垂死掙扎，當也在情理範圍；況且六國同為周室所出，秦吞東周而併諸侯，此中道德位階又該何說？似應只聞刺「一獨夫紂」，不該視為「害盟會之理」。²⁶由此反思蘇、王等，挪他人之垂死掙扎，為自己國家位階的評述與道德論據，

25 王書輝曾以「白衣非喪衣」重探「易水送別」。見王書輝，〈壯士為何一去不復還——荊軻慷慨赴秦的心理解析〉，《歷史月刊》217(2006.2): 133-135。

26 袁枚〈荊軻書盜論〉有精彩的辨析。清·袁枚著，周本淳標校，《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文集》，卷 20，頁 1583-1584。

細思也不近人情、不甚道德。況且，大國取人之邦，又豈真是仁義之師？想來亦只是堂皇文飾之下的各種經濟、武力侵略而已。

只是撇開浪漫幻想的情懷，排除政治正統論的道德批評，試著貼合真情實境，卻談何容易？畢竟，《史記》之後，刺客不再進入正史敘述中，導致藉由讀書知理者，除非身歷其境，實難以掌握荊軻的心情。想這也是歷來評論、歌詠諸家的眼目，總自限於上述兩種框架的緣故。

從近代外交史的角度來看，晚清到民初的國際局勢，猶如戰國時代，其中合縱連橫，爾虞我詐，中國面對世界所運用的觀念，再也不能是朝貢、羈縻、分封等中國中心觀，而是在國際法體系中，與各國交涉、談判。²⁷ 撇除辛亥革命暨國共兩黨所利用的民族主義思想及其相關政治宣傳手段，²⁸ 這些國際交涉、對外事務，讓中國文人、知識分子，又彷彿重臨戰國的現場。²⁹

四、從汪文人的詩詞勸諫與汪精衛的烈士情結

自 1931 年起，國民政府就面對日本帝國的蠶食鯨吞與歐美諸國的冷漠以待，其國際大局與心中恐懼，去戰國燕秦之勢，可謂相差無幾。此或 1940 年代汪政權諸人所以能以荊軻情境自比的原因。

《同聲月刊》第 2 卷第 2 號載有汪精衛七律兩首，題曰〈豁齋出示「易水送別圖」，中有予舊日題字，並有榆生、釋戡兩詞家新作，把覽之餘，萬感交集，率題長句二首〉，豁齋即任援道，任汪政權蘇浙皖三省綏靖軍總司令。1949 年後居港，走加拿大終老。³⁰ 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

27 (日)川島真著，田建國譯，《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20-42。

28 唐啟華曾以「日本二十一條要求」與「中日民四條約」為例，藉由中日檔案所呈現的「史實」，對比國、共「革命史觀」下所扭汙北洋政府之「神話」。唐啟華，〈中國對「二十一條」的抵制：兼論外交史中的「神話」與「史實」〉，黃寬重等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2008)，頁 333-350。

29 清廷於 1899 年與 1907 年都派代表參加海牙和會，參與當時會議的駐俄公使胡惟德在紀錄中稱「輿內之各國形勢與春秋時代無異。春秋以來雖踰年兩千，然現今每項內容卻仍與其時相符……」(日)川島真著，田建國譯，《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頁 11。

30 任援道(1890-1980)，號豁齋，江蘇宜興人，著有《青萍詞》。

案」，任援道堂弟任西萍曾兩赴上海，策反任援道。任西萍報告稱「三十年秋（1941），孫、馬兩公以勝利在望，曉以爲黨國效力之大義，並應努力洗刷家庭之恥辱，第二次奉命復滬，由中央指定，受戴局長雨農之指導，積極對任部進行策反工作。三十一年春間（1942），得任援道之允許，秘密與該部中上級幹部發生關係，開始向部隊之中堅份子灌輸抗戰建國之信念，逐漸發生效力。自十二月八日以後，該部更加堅定抗戰必勝之信心……」，³¹ 所稱三十年秋「勝利在望」，恐是事後諸葛之詞；而三十一年春間得遊說任部軍官，蓋爲太平洋戰爭爆發之故，任援道有所動搖，此正與任持「易水送別圖」以示汪精衛的時間吻合。

榆生，即龍沐勛，《同聲月刊》主編。龍是晚清詞學大家朱祖謀臨終授硯的弟子。汪精衛廣東鄉試時，朱祖謀正任廣東學政；故以傳統觀念言，汪、龍有師兄弟之誼，而汪精衛亦多次齎金贊助龍榆生出版乃師《彊村叢書》。³² 雖然龍榆生並未在汪政權中參贊機要，但龍、汪以詩詞結緣、交心，可見一斑；³³ 釋戡，即李宣倜，³⁴ 任維新與汪政權印鑄局局長，常於汪政權時期在其寓宅橋西草堂舉辦雅集、「星飯會」（汪精衛、梅思平提供經費），攏絡從汪文人。³⁵ 三人俱汪政權中核心人物或與汪精衛有詩詞之交。

「易水送別圖」，乃嶺南畫派三大家之一，同時也是汪精衛知交同志的老

31 見《朱家驊檔案》，〈任西萍報告與任援道工作經過〉（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編號：301-01-23-117），頁 3-4。此條文獻，先見於徐吉村，「地下戰場：戰時重慶國民政府與汪政權的暗鬥」（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5），頁 185-186 之引用。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專家的意見。

32 張暉，〈盡吾身力不傍徨——汪偽時期詞人龍榆生的文化政治活動〉，沙先一、張暉，《清詞的傳承與開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368-388。

33 龍榆生，〈陳璧君手抄本雙照樓詩詞稿跋〉有：「余十數年來以倚聲之學受先生知遇，仲鳴既歿，先生每有所作，必飛箋見示。自二十九年後手書篇詠，存余篋中者十之六七」。又《龍榆生先生年譜》載龍受汪妻陳璧君之託，存有兩箱汪氏相關手稿。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亦認爲龍榆生是藏有汪精衛遺書並寄往香港企圖公布之人。此俱可見龍雖未參贊汪政權機要，但與汪詩詞交心，直在不言中。汪精衛著，陳璧君手抄，龍榆生校跋，《雙照樓詩詞稿》（1945 年陳璧君獄中手抄贈端木愷本，臺北：東吳大學圖書館藏影本），抄本無頁碼。

34 李宣倜（1883-1958），字釋戡、蘇堂，福建閩縣人，著有《蘇堂詩拾》。

35 潘益民，《陳方恪年譜》（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頁 156。

友高奇峰（1889-1933）所繪，今似不傳，³⁶ 惟是畫成於抗戰之前，殆無疑義。³⁷ 至於畫上汪之「舊日題字」，味是時情境暨精衛生平與眾人詩意，亦極有可能是汪政權成立之前甚或更早而作，至若「榆生、釋戡兩詞家新作」與汪精衛所題「長句二首」，大抵成於 1941 年深冬以後，到 1942 年 2 月 14 日之前，即 1941 與 1942 年之交。³⁸ 是時也，太平洋戰爭爆發（1941 年 12 月 8 日），日美交戰。汪政府為脫離日本附庸國的角色，屢次遊說日相表明「南京政府」參戰之意。企圖以「參戰」此一同盟關係，使所領導的南京政權在國際關係中與日本達到平行的地位。³⁹ 另一方面，對重慶國民政府而言，英美終於被拉入亞洲戰局，抗戰出現轉機，亦趁此機會，由抗戰改為對日宣戰。此一關鍵時間點，是理解汪等唱和詩詞的重要線索。

（一）問誰深知我

當汪精衛從任援道手中接下畫軸，展卷開圖，映入眼前的是老友高奇峰之畫作，還有自己往日的題字，接著，看到龍榆生、李宣倜詞作而發感懷。

-
- 36 高奇峰過世前急電汪精衛，囑託畫作與身後事。高曾作「長松壽帶圖」（1932）贈汪，題詩「老幹飽經霜，喬柯恆蔽日。共葆不凋心，河山添壽色」；汪秘書曾仲鳴之妻方君璧亦高奇峰弟子，足知汪與高家交情深密。見汪精衛等編，《高奇峰先生榮哀錄》，收於《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 88 冊。龍榆生詞曰〈水龍吟為豁齋上將題高奇虹畫「易水送別圖」〉，案「虹」應為「峰」。任援道之子任祖新稱不知有是圖之傳。
- 37 高奇峰，廣東人，與其兄高劍父（1879-1951），同里陳樹人（1884-1948），並稱民初嶺南畫派三大家，三人皆同盟會成員，與國民黨關係緊密。案，高奇峰病逝於 1933 年，「易水送別圖」當作於此年之前。
- 38 張江裁，《汪精衛先生著述年表》繫該詩於〈菊〉之後與〈辛巳除夕寄榆生〉之前。〈菊〉詩有句「殘英在枝頭，抱香終不墜。寒梅初破萼，已值堅冰至」，知為仲冬時節，應屬 1941 與 1942 年之交。辛巳年除夕為陽曆 1942 年 2 月 14 日，以是推知作期。《著述年表》，頁 719。再者，《忍寒詩詞歌詞集》中，龍榆生〈水龍吟題高奇峰畫「易水送別圖」〉，前有〈哭大厝居士三首〉（案：易大厝 1941 年 12 月 26 日過世），後有〈水調歌頭辛巳十二月十九日（1942 年 2 月 4 日）……〉，知龍作寫於 1942 年 1 月間。故任援道持龍、李題詞之圖示汪之際，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龍榆生，《忍寒詩詞歌詞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 73-75。
- 39 北洋政府因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為戰勝國，並在巴黎和會中把握與諸國重新修訂條約的契機。汪精衛之參與軸心國，亦有意於此。分見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67-81。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臺北：國史館，2001），頁 370-377。

本文且依「詩題」中汪所見詞作先後，依序分析其中情感、思想的發展脈絡。龍榆生詞曰：

所期不與偕來，雪衣相送胡為者。高歌擊筑，寒波酸淚，一時俱下。血冷樊頭，忍還留戀，名姬駿馬。問誰深知我，時相迫促，恩和怨，餘悲咤。
孤注早拚一擲，賭興亡、批鱗誰怕。秦貪易與，燕仇可復，逕騰吾駕。日瘦風悽，草枯沙白，飄然曠野。漸酒醒人遠，暗祈芳劍，把神威借。⁴⁰

龍詞第一韻「所期不與偕來，雪衣相送胡為者」的埋怨語氣，其說話主體正是荊軻本人。是句典出《史記》〈刺客列傳〉：「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⁴¹所謂「往而不返者，豎子也」，正見荊軻在此行動中，自我期許的是曹沫般謀國方略，而非徒具專諸、聶政之報恩與死志。回到龍詞，是句意指：若所待者能來，則成功機率大增，此際白衣相送，究屬何意？豈真以我輩之行，屬於「往而不返」之豎子耶？（龍榆生大概與辛棄疾等一樣，將「滿座衣冠似雪」喻為自分必死的「喪衣」。）也因成功率降低，自分必死，遂「高歌擊筑，寒波酸淚，一時俱下」。「俱下」二字，字義上歸結「高歌」、「寒波」兩句，卻同時也是詞中韻處。以詞義言，「俱下」不但操控著歌聲筑曲的走勢，亦引出寒波之逝與虎目之淚，情景交織，融成一體；以聲情言，此乃仄聲韻的力道所在，如重歎，如深憾，仿若與聞高歌之咽止與壯士吞淚之聲。再進一步說，「酸淚」所深憾恨者，竟是「燕太子丹」之懷疑、誤解與不能忍，故龍詞擬荊軻口吻自清道：樊將軍之犧牲猶在目前不敢或忘，此刻躊躇未發，難道真是留戀美女財富？

由此可明，龍詞旨切於「備受誤解的心情」，其「問誰深知我」五字呼應

40 龍榆生，〈水龍吟為豁齋上將題高奇虹（峰）畫「易水送別圖」〉，《同聲月刊》2.2(1942.2): 148-149。此闕詞同載於《同聲月刊》2.3(1942.3): 100。後《龍榆生詞學論文集》所收龍詞，稍有異文，以『』標示摘錄於下：「高歌擊筑，『柔』波酸淚，一時俱下。」、「日瘦風悽，草枯沙『淨』，飄然曠野。漸酒醒人遠，『要憑寒劍』，把神威借。」見龍榆生著，《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557-558。

41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86，頁 2533。

此前諸句，下得沉痛有力，是詞中極關鍵處；而這五字又與「時相迫促，恩和怨，餘悲咤」連成一韻，串出友朋不來、同志犧牲，內部的誤解質疑，外部的韓亡燕危，所有的情勢指向不得不發，而該有的準備卻又未完全，可謂悶矣亟矣。

換片「孤注早拚一擲」，躍然脫出上片因內外交逼致使的孤思亂緒；「早拚」二字，豁顯本始志意。荊軻由此而自表非屬貪生之徒亦非受激之血勇，乃是盱衡局勢如此、事前準備如此、內外交逼如此，仍一秉初衷而願往，願一「賭興亡、批鱗誰怕」，故以「秦貪易與，燕仇可復」為信念而「逕騰吾駕」毅然西去。「日瘦風淒，草枯沙白，飄然曠野」，寫渡易西去後一片寒澹之景色，此處以景作情，詞筆高妙，「日瘦風淒」之零落，局壞也；「草枯沙白」之蒼茫，事蕪也，惟「飄然曠野」既自寫西去之豪壯身影，亦寫其審時度勢、知時知勢之後仍毅然為之，不以成敗生死掛懷的國士心忱。

最後「漸酒醒人遠，暗祈芳劍，把神威借」，寫酒醒後復歸平靜情緒，回到行動的當下：風淒日暮，歌歇人渺，短劍單車，步入秦庭。「暗祈」二字，同時涵括了荊軻堅實的信念與秦庭現場的不確定性。而龍詞結於「把神威借」此一未盡之盡的祈禱、自誓中，將悲劇性的高潮與結尾盤空勒住，更顯結煞處的遒勁力道。

龍榆生用荊軻的口吻寫易水送別，鋪敘各種孔亟形勢，而歸結在「誤解」二字，此乃龍氏發揮之獨見。在龍詞中，荊軻的胸懷、情感、性格與抉擇，全迴繞此「誤解」而發展，甚至越是拖磨，越顯荊軻之深沉韜略與磐石堅志。

綜上而論，龍詞為荊軻故事的詮釋傳統注入最重要的啓發與創意者，即是側重「自易水送別之後到圖窮匕現之前」這段過程，荊軻因遭受「誤解」而衍生的各種心理壓力與抗力。其實，自〈刺客列傳〉來看，曹沫、專諸、豫讓、聶政，實無一膽小懼死者，故知荊軻西行之苦抑，在於以燕趙之士、仇秦之志，⁴² 卻挾燕之督亢圖、函樊於期之首，以使者名義，貢於秦庭，其心中的掙扎與焦慮，當然不是死亡與犧牲，而是無論如何，在圖窮匕現之前，

42 《史記》：「荊軻者，衛人也。……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後荊軻至燕與狗屠、高漸離相飲高歌於市，「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頁 2526-2528）故知其國滅而所以為仇秦之士也。

必得背負著誤解的聲名。烈士之受苦，莫過於此。

固然，使秦之策，無論現場挾持或淬毒行刺，都算一條反間計，由白居易有「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句可為荊軻設想，若最後時機不稱，無法展圖拔劍，不但大勢之壞，大節亦將有虧，終古不得翻身。依《史記》云，當日荊軻手捧於期首，秦舞陽持督亢圖。足以挾秦王之機會與武器在舞陽手中，荊軻實屬指揮現場、負責威脅與談判者。於此可知，若無荊軻臨場隨機應變，與秦舞陽換手，匕首甚至將無出圖之機會，荊軻念念不忘「欲與俱」之客，其將替換秦舞陽之角色耶？故陶潛「惜哉劍術疏」之歎，實非合情之論，因為自始至終，燕太子丹等就許荊軻以外交使節與現場指揮者之重擔，而非責諸近距搏鬥之任。

龍榆生所以能擺脫前人框架，體會出荊軻「自易水送別之後到圖窮匕現之前」這段困於誤解、難以自申的複雜心理，除了龍氏本人的涵養、學問與詞之為體的特色外，⁴³ 未嘗不是此際身丁汪政權特殊情境中而致成的異世共感。蓋東瀛自日俄、甲午戰爭後崛起，或欲脫亞入歐、或欲以東亞霸主自居，惟對中國的侵逼從未止息。

再者，當時日本內閣與軍部相互拮抗，甚至陸、海軍之間也因爭功奪權而各懷謀略，有北進、南進與溫和各種軍事謀略，是以在其蠶食鯨吞的過程中，日方各派對中國境內諸勢力的拉攏亦不一致。故除卻汪政權，日方先後扶植滿洲國、北平臨時政府、南京維新政權，亦有不停向重慶招手的「桐工作」、「錢永銘工作」等。而且，日汪雙方表面上攜手合作，實亦各懷心機。從汪政權的角度來說，親日應親到何種程度，方不被懷疑有反間、拖延日軍戰程之嫌，是需要謹慎拿捏尺寸。而同時，抵制拖延日軍對占領區之剝削，如何做到最大程度以保護淪陷區百姓，也是其自我定位與期許。由此看來，汪政權此際與荊軻「易水送別之後到圖窮匕現之前」這一段心理交戰，實有微妙地相似共通之處，從龍榆生的角度來看，在汪精衛不亮出自己最後的匕首之前，大概都得陪笑地對「秦王」表示：「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云云。

43 葉嘉瑩認為，詞以弱德為特色，詞人內心之堅持與外界壓抑相抗衡的委屈呈現。葉嘉瑩，〈從艷詞發展之歷史看朱彝尊愛情詞之美學特質〉，《清詞名家論集》，頁 155-156。

龍榆生聚焦於「誤解」，聚焦於友朋同志的支持與否、理解與否，最後結煞於荊軻故事最有希望復又最悲劇性的時刻，汪精衛於「千夫所指」又「一意孤行」的時刻覽此，所謂「萬感交集」者，殆謂此乎？

（二）非常時期的外交手段

接著龍詞之後，汪精衛讀到李宣倜所題〈滿江紅〉，詞曰：

煮酒談天，且休笑、荊卿謀拙。燕趨勢、虎蹊委肉，幾何能輟。功就定誇曹沫勇，身亡未讓專諸烈。算當時、百計費沉吟，方投玦。一諾感，田光節。片語濺，於期血。豈縱橫遊俠，恩酬冤雪。短劍單車汾水遠，高歌哀筑秦宮歇。甚丹青、千載卷圖看，酸風咽。⁴⁴

不同於龍詞第一人稱的悲咽情懷，李宣倜以史評立場起句，蓋屬宋人一系以俯覽全域、布局謀略自任的視角。依此而知，李詞旨在議論，甚至提出建言。當然，這不是政策意見書，乃所謂「言者無罪，而聞者足以戒」的諷喻傳統（本來，在非常時期直接諫言，小則進言者喪命，大則混亂眾心，為自身為領導者，甚至為全局考量，都不應突兀進言）。

李詞頭一韻就與東坡的持論對立。其「且休笑、荊卿謀拙」，即針對蘇軾「（燕丹）胡為棄成謀，托國此狂生。荊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的批評而來。再者，李詞「燕趨勢、虎蹊委肉」，形容局勢孔亟、間不容髮，⁴⁵ 反對蘇軾以為秦「滅身會有時」、荊軻等「徐觀可安行」，這種聽諸天命、置身事外的角度。所以，「幾何能輟」的反問，正見李宣倜認為「荊軻刺秦」，乃存亡生死攸關，有不能再忍、不可再待之迫切。

本詞既以「煮酒談天」、評騭歷史自許，則緊接著的「功就定誇曹沫勇，身亡未讓專諸烈」一韻，遂顯李氏側重所在。兩句俱用〈刺客列傳〉典故，前句曹沫趁齊魯外交場合，挾齊桓公，使其允諾盡返所侵魯地，故云「功就」；

44 李宣倜，〈滿江紅題「易水送別圖」〉，《同聲月刊》2.2(1942.2): 147-148。後李宣倜《蘇堂詩拾》作「短劍單車『濡』水遠」。

45 西元前 228 年，秦滅趙後，王翦屯軍中山故地，預備滅燕。隔年，燕太子丹派荊軻赴秦行刺，敗績。秦王遂以為藉口，於西元前 226 年派王翦率兵攻燕，大敗燕、代聯軍，遠逐燕王喜於遼東。由此可知，無論荊軻出與不出，秦軍戰略方針必已決定攻燕，以防攻取他國時，遭燕國繞北境而襲擊。蘇洵〈六國論〉所謂「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其意頗令人費解，秦之滅燕，迫在眉睫，縱丹計不行，亦何可遲速？

後句專諸爲公子光（吳王闔閭）爭奪王位，以魚腸劍刺死吳王僚，惟亦受亂刀而死，雖曰「身亡」，實亦功成。考〈刺客列傳〉所序五人，除荊軻外，曹沫盟柯，功在社稷；專諸身固滅卻爲主得國；豫讓是身死而仇未見報；聶政不過爲嚴仲子報卻隙之仇而犧牲；故知李宣倜所以不用豫讓、聶政舉例，而選典於曹沫、專諸者，正在曹、專二人無論死與不死，皆屬功成而謀國者，此與荊軻沉深好書的作爲與行事，方爲貼合，也可見李詞擇典之切。

再進一步說，所以對比曹沫、專諸而分上下句者，正是因爲這分別代表荊軻行刺計畫的兩部分。前文已表，荊軻使秦之計畫，上策取法曹沫，欲趁機逼使秦王退讓，立下文字約，承諾永不犯燕；下策爲刺死嬴政，動搖秦國中樞，使大軍在外而中內無主，陷秦國於朝野交忌之境。如此一來，諸國得以喘息，重新結盟。這組對句中，「功就定誇」、「身亡未讓」，皆未來式，李宣倜以曹、專二例，接入「算當時、百計費沉吟，方投玦」完結上片。玦者，決也。其推想荊軻當日之心事如斯，謀略如斯，而最終決策如斯也。但是，李宣倜所以點出此者，究與汪精衛甚或汪政權有何干係？

自 1932 年蔣汪合作以來，汪精衛就堅持以外交手段，與日謀和，卻不幸於 1935 年遭刺，導致國民政府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遂在之後的「西安事變」影響下改弦易轍。⁴⁶ 抗戰中途，汪精衛離渝呼應日相近衛文磨第二次聲明，派人與談重光堂密會。最終在日人扶持下成立之汪政權，即以近衛第二次聲明爲原則，與日以外交手段謀和，企圖以和止戰。但是，自 1940 年 3 月底汪政權成立後，就積極與日展開會談的和約，然《中日調整國交基本關係條約》及其相關附屬議定書之結果，卻不盡如人意，甚至可以說，在外交這條路飽受挫折與欺騙。若比附於李詞，此正所謂「曹沫之謀」的失敗，但那「專諸之刺」呢？此詞作期，正逢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終於被拉入戰場，再不能作壁上觀，李宣倜於此際點出上、下兩策者，是提醒上策既已走到盡頭，此時不行下策將無以謀國，復無以自清、無以雪冤乎？此處之切古典、合今情，以勸以諷，亦勉亦哀，可謂絕筆。

換片「一諾感，田光節。片語濺，於期血。豈縱橫遊俠，恩酬冤雪」，「豈縱橫遊俠」，「豈」，猶「覲」，希冀也。東方朔〈七諫〉：「追悔過之無及兮，

46 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頁 394-395。

豈盡忠而有功。」王逸注：「已欲盡忠直之節，終不能成其功也」，⁴⁷ 李句意指冀能一逞遊俠縱橫，以酬恩雪冤。而所謂酬恩者，酬長者田光知己之恩；雪恥者，即荊卿自「易水之後到匕現之前」此一段時間的不被理解。前者論龍榆生詞作已表，當時荊軻等人，挾督亢圖、函於期首，渡易入秦，正所以被六國仇秦之士所皆裂髮指者，故荊軻易水悲歌，更在意的是近遭燕太子丹誤解，遠受同為仇秦之士的謫指；白衣冠之送行，只是密行其事，而世所謂「壯士一去兮」之自分必死的哀歌，亦屬忿忿於冤屈，憂懼壯志未遂則聲名難復；荊卿高歌，實李陵之仰天嘯，而遠非阮籍之窮途哭。

「短劍單車汾水遠，高歌哀筑秦宮歇」，兩句之「遠」與「歇」，寫人既渺遠而歌亦歇止，彷彿只能看到荊卿一行人啓赴秦國，而無法確知結果何如。讀者只有從遠景的畫面中懷想、企望。宣侗詞筆，將荊卿最後之行動，俱付於一猶如電影畫面之長鏡頭，而這一往後拉開的手法，使得原本沉陷荊卿悲抑氛圍的讀者，隨著景遠聲寂的畫面，逐漸淡出、回神、冷靜，回到畫軸之前，一名評圖論畫的客觀第三者。

但是，李詞旋即接上「甚丹青、千載卷圖看，酸風咽」，「甚」字，近似白話口語的「為何」、「為什麼」之意，如辛棄疾〈八聲甘州〉「甚當時，健者也曾閑」，如強以白話譯「甚丹青、千載卷圖看」，可作「為什麼千載以下我們仍看此易水送別圖」。李詞句構大意如蘇軾「至今天下人，憫燕欲其成。廢書一太息，可見千古情」中，以天下人至今猶不忘荊軻事作結，但字義背後，卻是反問「荊卿故事千載以來受人圖之詠之歌之不絕、念念不能或忘者，究屬何因」？此一質問，字面上固歸結於易水送別時「酸風咽」的情景互融之象，實際上，所以說千載之下尚得眾人展圖評說，當帶著「還看今朝」的期許。也就是說，今朝酸風重咽、易水再別，情景彷彿當日，而「今日之荊卿」，意欲何謀呢？⁴⁸

在李宣侗、龍榆生眼中，此刻重展畫圖，現在謀略和處境，與當時、與畫中，與納首獻圖以入咸陽宮的氛圍何其相似，歷史又重複上演，這次的刺

47 宋·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241。

48 李宣侗，〈壁畫存影引言〉云：「古者寓諫於畫，圖往跡之可備勸懲者於堂墀。」知李題「易水送別圖」當蘊深意。李文見陳道量編，《國藝月刊》1.2(1940.2): 2。

客行動，將會成功抑或失敗呢？龍、李二詞的結煞處，都蘊藏「還看今朝」之意，汪精衛將如何回應？

（三）汪精衛的決定與烈士情結

龍、李二闕，詞意悲壯，各有意旨與發揮，其於古典闡揚，龍榆生指出荊卿自渡易到圖窮匕現前所承受的誤解壓力，與從汪文人以沫取暖；李詞挑明荊軻使秦計畫中，劫秦與行刺互為表裡兩部分，蓋欲激揚汪之志意，同時勸其把握良機。

惟二闕俱不寫荊軻故事的結局，龍詞結於「暗祈芳劍，把神威借」，李詞說千載以下，酸風重咽，俱隱括「還看今朝」的期許。汪精衛覽圖辨字，得龍榆生、李宣倜新作之惺惺相惜、以諷以勸如此，自不能不知同志所期於己者，同時也正可對「知我者」一剖衷腸，遂於萬感交集中，題下七律二首。⁴⁹ 詩其一曰：

酒市酣歌共慨慷，況茲揮手上河梁。懷才蓋聶身偏隱，授命於期目尚張。
落落死生原一瞬，悠悠成敗亦何常。漸離筑繼荊卿劍，博浪椎興人未亡。

這首詩除腹聯外，餘聯俱切友朋知己而發：如第一、二句荊卿、狗屠、高漸離與蘇武、李陵；第三、四句蓋聶、樊於期；第八句張良及其力士。這些朋友，有不助之而深隱者，有輔翼之而犧牲者；汪詩用諸友相聚暢飲、生離死別、誤解與交心，捨身與繼志各例，照見其與同志知己砥礪相謀，共行其事的願望。

首聯「酒市酣歌共慨慷，況茲揮手上河梁」，上句用易水送別以前事，下句乃蘇李河梁分別，固都切一「別」字。然而，上句朋好聚首，把酒痛飲，快之何如；下句蘇武李陵，同囚匈奴，一受尊為千古忠孝之臣，一遭齒冷於降將叛徒之列。對比於酒市酣歌之慷慨與交心，河梁揮別所嚙入之誤解與惡名，益顯不堪。而這首詩的重點，就是這句把「易水送別」陡然變為「河梁分別」的「況茲揮手上河梁」。本來，燕市酣歌後，該是易水送別，典故脈絡本應如此，但汪氏「況茲」兩字以彼易此，用河梁之別的被誣心情，偷渡進

49 汪精衛，〈豁齋出示「易水送別圖」，中有予舊日題字，並有榆生、釋戡兩詞家新作，把覽之餘，萬感交集，率題長句二首〉，《同聲月刊》2.2(1942.2): 139。

「易水送別」，不但呼應龍榆生所著墨「問誰深知我」的委屈，同時也使得頷聯「懷才蓋聶」、「授命於期」之誤解與犧牲，更顯厚度與重量。面對友朋同志，汪精衛知道自己所承擔，已不光是荆軻之於田光、太子丹、樊於期，而是李陵於其沫血飲泣的五千步兵矣。這聯中呼之欲出的助與不助、隱與犧牲，無退路而必赴行之抉擇，足見汪詩的力道及後勁。

惟汪句逕搬自李陵〈與蘇武〉其三「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得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⁵⁰既化用此詩首句爲典，則「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不亦正在其語境中？也因「弦望自有時」，腹聯接上「落落死生原一瞬，悠悠成敗亦何常」遂在使句聯類的脈絡裡。此聯著力打開前兩聯坎坷崎嶇之心事，不以生死利頓禍福爲意，致力於「崇明德」。「落落」，多而連續不斷貌；「悠悠」，連綿不盡貌。兩句意指古往今來幾多豪傑壯士之死生，不過轉瞬；而或成或敗，並無定數。所以尾聯云，不但「漸離筑」能「繼荊卿劍」之後，連隔代亦將得同志，興椎於博浪，繼承刺秦之志。所謂生死、所謂誤解，未須以一時一地之成敗論也。此詩以豪語化開龍詞悲抑之情緒，而所謂將有來者繼志，自然也就暗示了「來者」能理解吾等，與吾等體貼同心。

細繹汪精衛所以挪友朋情感作爲這首詩的基調，近感於繪圖者高奇峰之舊交，出圖者任援道之勸誘，詞家龍榆生之同心，李宣倜之激勵。⁵¹甚或遠思改組派大將顧孟餘（1888-1972）之不來，高宗武、陶希聖之出走，復回顧外交部次長唐有壬（1893-1935）、摯友曾仲鳴（1896-1939）、外甥沈次高（?-1939）等之被刺犧牲，「和平運動」至今，收效甚微，心中感慨萬千。

龍詞所謂受誤解而欲雪冤，李詞所主張此時將出以專諸之刺者，似在提醒汪精衛，趁此一著，爲己雪冤，示天下絕非徒以督、亢地圖拱手於人也。

50 逢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漢詩卷 12，頁 336-342。

51 汪與高奇峰交情，見汪精衛等編，《高奇峰先生榮哀錄》。汪政權成立，汪精衛曾招嶺南三大家另外二人高劍父（奇峰兄）、陳樹人相助，高、陳與汪雖有故舊之宜，亦斷然拒絕。高劍父且作「燈蛾撲火圖」（1940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諷之。汪精衛，《雙照樓詩詞稿》有〈題陳樹人「娘子關秋色圖」〉。見蔡星儀著，《高劍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 54-56。

汪則回應友朋同志之交心與理解，企圖寬解龍榆生詞作中，致憾於「備受誤解」的忿忿，而最終期以異代知己，必有能相知深知者，詩情豪壯。

第二首詩，前半詩情低沉黯淡，蓋汪省記自身處境，遂放入更多悲抑、複雜的情緒，後半卻對龍、李建言有所回應，壯懷激越，詩曰：

少壯今成兩鬢霜，畫圖重對益徬徨。生慚鄭國延韓命，死羨汪錡作魯殤。
有限河山供墮甌，無多涕淚泣亡羊。相期更聚神州鐵，鑄出金城萬里長。

從首聯「少壯今成兩鬢霜，畫圖重對益徬徨」可知，詩題所謂「舊日題字」，大概就是與日謀和前（甚或抗戰前）所題詠者無疑，否則重對畫圖，何需徬徨？此詩作期，汪精衛將屈耳順之年（58 歲），其距行刺攝政王，匆匆三十年過矣，而今日眾人重以荊軻之任屬我，則往日所為，盡付無功；今之所作，終得何名？思前想後，舉步躊躇，遂以頸聯「慚」「羨」二字，領出此際心境。

上句「生慚鄭國延韓命」，「鄭國」，有今典與古典；古典出《史記》〈河渠書〉：「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⁵² 今典是汪精衛曾在抗戰爆發不久後，有演講（1937 年 8 月 13 日南京廣播演講）談到戰國時代韓人鄭國，曰：「中國歷史上有兩句最痛心的：一是鄭國說：『臣為韓延數歲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明知不能救韓之亡，而徒欲延其數年之命；這樣的以人參湯來延最後之喘息，到底不是辦法。一是張悌說：『吳亡之際，乃無一人死節，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吳之亡，而惟欲一死以自盡其心……」，⁵³ 汪氏所舉二例，前者為解釋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對日政策由退讓轉為抵抗，稱此時不該再忍辱，忍辱只能求得緩亡而已；後者為激勵民心，要軍民共同攜手抗敵、死國。但是，1938 年年底，汪精衛以局勢大壞，決定與日謀和，到了今年此際（1942 年 1-2 月），卻已明白，就算企圖辱身謀和，以為止戰，都屬困難非常。「生慚」句透露出對此刻與日交涉無成的自知之明，故自嘲自諷，言愧言慚也。但置入「鄭國」句者，不亦自問「和平運動」至今所為，能比諸鄭國乎？此際如不能拖住日

52 漢·司馬遷，《史記》，卷 29，頁 1408。

53 汪兆銘，〈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見包清岑編，《抗戰文選》（《民國史料叢刊》第 277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頁 300。

軍的攻勢、不能減緩日人對占領區的剝削，使日方有效地與南京政權「合作 (collaboration)」，則甚至連「延韓命」都做不到，尚愧鄭國，(言外之意爲)更何有於荊軻呢？由此自我警惕，婉拒並勸告龍、李諸人放棄其展圖拔劍的建議。

頷聯下句「死羨汪錡作魯殤」，果然變化自汪精衛所謂「中國歷史上第二句最痛心的話」——「吳亡之際，乃無一人死節」句意。「汪錡」，典出《左傳》：「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⁵⁴汪自以「爲間」、⁵⁵爲「和平運動」犧牲，與汪錡「執干戈以衛社稷」無異，皆死國也，但一童子奮其勇力，即得國殤，我以鄭國心事爲秦作渠以延韓命，卻受「漢奸」之目，能不羨乎？

頷聯兩句，是汪自謂最痛心的句子，蓋想起曾經言論，此際盡遭翻盤且每況愈下，故萬感交集，自慚自愧也。當然，若把「生慚鄭國延韓命，死羨汪錡作魯殤」以流水對來理解上下句的因果與順序，則：生既已如鄭國所爲，此際死國豈能得魯殤乎？想來汪精衛要指出，此時出劍行刺、死節，亦未必能得洗漢奸之名，不過是自以爲的死節，不但終究不能爲魯殤，且甚至將使這目前看來不太成功但卻是唯一的「延韓命」計劃遭到中斷。(當然，「能否爲魯殤」，此想法因人而異。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從汪諸人，由上至下，多漸與重慶或延安政權有所聯絡，雖說暗助抗戰，實亦棋壓兩著。)

腹聯「有限河山供墮甌，無多涕淚泣亡羊」，振起前四句自慚自愧的情緒。上句典出《後漢書》〈孟敏傳〉，⁵⁶指責重慶政府拉長戰線及其焦土策略，下句不願以眼淚報國，自許唯有努力修牢補亡，挽狂瀾於既倒。此一不願河山供人斷送，欲爲國家保留幾分元氣就是幾分的初衷，正將其所以慚、所以羨之私人心事，拋諸腦後者。

54 《左傳》(《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卷 58「哀公十一年」，頁 1016-1017。

55 此與後流出之汪精衛〈最後之心情〉的意圖相同。金雄白認爲，該信件乃陳璧君交付獄友龍榆生，而由龍懷藏多年，最後密寄予正在寫作《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的金雄白，請代爲公布。金雄白曾於該書中反覆申辯該信之真確。美國學者博伊爾同意金說。(美)博伊爾(John Hunter Boyle)著，陳體芳等譯，《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 1937-1945》(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頁 503-507。

56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68，頁 2229。

因如此振起，結聯「相期更聚神州鐵，鑄出金城萬里長」，目標與行動遂與荆軻行刺迥異。「鑄鐵」之喻，變化自汪精衛於庚戌行刺前，發表在《民報》的「釜薪之喻」，只這次汪精衛不是燃薪，而是鎔釜，將鑄鐵以造長城矣。在汪原始的比喻中：「釜之爲用，水不能蝕，火不能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變其質，以致於成飯，其熬煎之苦至矣，斯成飯之要素也」，⁵⁷ 蓋將自「爲薪」犧牲，行刺攝政王，而期許胡漢民等「爲釜」煎熬，開創民國也。然而，1942年此際，聚集鍋釜鐵具，則望以非常之時期，以非常之烈火鎔之、錘之、鍛之，甚至犧牲原本釜鍋的外貌，碎骨粉身，在所不顧。汪精衛結聯期於變形之釜、新鑄之牆，氣勢非常。

汪擺落刺客悲劇結局的困境，而以百鍊千錘的「神州鐵」自況，並期勉參與和平運動的同志。如果以身作薪是拋卻性命，則此際鎔釜之決心，當不顧聲名矣。一生不恃武力，僅憑聲望縱橫民初政局的汪精衛，自願爲此戕名毀譽之舉，是知胡適所代言的「我性命尚且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當更進一步說，「我性命與名聲皆棄之不顧，你們還能不相信我嗎？」

當然，汪精衛心底也不可能不明白，相信與否，操之他人而不在我。更何況「鎔釜」將拋卻釜之爲釜的外貌與功能，且「鑄城」甚至甘爲磚瓦用。在外貌與功能俱已改易，僅從鐵的本質訴索他人之理解與信任，不啻冒險且困難。如以刺秦故事中的荆軻、太子丹、燕王喜的位階問題思考，設當日荆軻或盟、或挾、或刺三者有一種成功，則可以活燕；乃若失敗，則燕王喜立與太子丹切割，輸誠於嬴政，置秦無可興師問罪之境，所以六國之中，燕是倒數第二個才被滅亡的國家。對燕國或燕王喜來說，在秦軍兵臨易水的當下，燕丹之計無論成與不成，實計之得。然而，對荆軻與太子丹來說，這卻是條極可能陷自己於身敗名裂境地的計策。⁵⁸ 由此思考，汪精衛這麼有自信且甘

57 守約（汪精衛），〈革命之決心〉，收於《民報》第 26 號（《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 2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4044。

58 秦子嬰曾進諫秦二世胡亥，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荆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後勝之議。此三君者，皆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其中「陰用」二字，可見秦國並不相信燕王喜對刺秦計劃毫無所悉。此與抗戰時期甚囂塵上的蔣汪雙簧說對看，意義更著。漢·司馬遷，《史記》，卷 88，頁 2568。「蔣汪雙簧說」，可參羅久蓉，〈中日戰爭時期蔣汪雙簧論述〉，《新史學》15.3 (2004.9): 147-201。

願的犧牲，或正同時自許了太子丹與荊軻的兩重身分：以荊軻為臨場挾秦交涉之人，以太子丹負責事敗後的切割與犧牲。

藉由上述的分析與思考，汪所和第二詩，反對「行刺」明矣。蓋「延韓命」須作到徹底、作到終了，而望眾人勿以無法實現之死節、烈士自視，寄望於不可能之聲名。並思荊軻列傳的文脈與「和平運動」二者，汪精衛應是不認同以刺客比喻此際的「和平運動」。因為荊軻故事的兩階段謀略有先後順序，必是挾秦失敗、談判破局，刺秦才會接著浮上檯面。如果現在眾人都以荊軻自比，那就等於預設／承認荊軻第一階段的謀略（外交手段）失敗。換句話說，因為荊軻故事的結局是無功的，所以在對外交活動（和平運動）尚抱一絲希望的前提下，不必也何苦用荊軻來自比。待到非引荊軻自比不可之際，已是承認「曹沫謀」之失敗，須出以「專諸刺」不可了。

從時局思考，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重慶國民政府自抗戰初期所期於歐美加入戰局、牽制日本者，終於可見端倪。此時汪政府當有兩種評估局勢的方向：從消極面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為鑒，沒有國家能與美國為敵，故汪政府或將隨日本勢蹙而走向敗亡，如此一來，「通敵」抑或「漢奸」二字，恐在成王敗寇下定型。以積極面說：太平洋戰爭初期，日軍火速攻占香港、東南亞諸島，勢固甚熾而補給線卻拉得更長，所期於汪政權者將更多，汪政權可趁此握有籌碼之機，重修 1940 年底的不平等條約，漸次收回各項主權。甚或要求加入戰局，進與日本成為同盟，達到國與國間的平行地位，由此脫離附庸角色。

所以，龍等歌詠「易水送別圖」，是認為勝利有望，故此際自礪、自清，欲為烈士、為刺客，仇秦（日）而忠燕（中），雪冤以洗名。這是詞家龍榆生、李宣倜或釋圖展卷者任援道的本意。但汪精衛「率爾長歌」，⁵⁹ 逕擲戰國甚或他代之典故，攪亂一番，似和而非和，自抒己意，扭轉眾人的意欲，回到汪認為該堅持的方向（「和平運動」）。

如果，汪精衛讀不懂龍榆生詞作所著墨於荊軻「問誰深知我」那份備受

59 從文體特性言，詩直抒其志，詞則婉曲達情。龍、李以詞陳情、探問，汪出詩和答，可見三人上下級僚屬關係，與龍、李諫言小心翼翼的試探性，及與汪示以磊落開明之回應。《文心雕龍》所謂「表以陳情」，龍等此例，可見詩詞於政治中的作用與範例。

誤解的委屈；如果，他讀不出李宣倜勸以坦承挾秦失敗、進以刺秦之策的謀略，就難免繼承前人舊說，以慷慨犧牲作為易水送別的基調，以史論史評作為論斷荆軻的談資。但他不但讀懂了，而且深一步，結合「易水送別」與「河梁分別」，以濃墨點化龍氏所感；以「鑄鐵」取代行刺，堅持含垢忍辱，甚至鎔釜鑄器、自毀形體，把「延韓命」走到最後一步，以回應李詞的建議。

不過，無論任、龍、李、汪四人的詩旨詞意為何，他們應該都同意，如斯境地、謀略與文學表現，是弱國於危急之秋、存亡關頭用以對抗侵略者的策略與不得不然的非常手段。這樣的策略與手段（反間、挾盟、行刺），不適合在中國史書成王敗寇的敘述脈絡中存在，故需要被扭曲與改寫（如蘇轍改寫〈刺客列傳〉），用以服務「太平盛世的大一統」思維。

由此可見，汪等此際的非常之行與文學作品，正保存了那些稍縱即逝、即被接下來「歌舞昇平」的盛世抹滅的行為、思考與心理。揭櫫汪精衛及從汪文人此際的心事與行為，可窺弱國對抗侵略者，無所不用其極，什麼都可以犧牲、拋卻的志意。

（四）反響與回饋

汪詩之後，李宣倜步汪韻，以兩首回答；龍榆生則融括汪精衛並眾人詩意，以筆名「鍾山隱七郎」編寫一齣歷史歌劇〈易水送別〉，發表於下一期《同聲月刊》；而任援道亦請得梁鴻志、陳道量題有七絕數首。

李宣倜步汪之作，載同期《同聲》中，題曰〈次均精衛先生「題易水送別圖」二首〉，⁶⁰ 詩中李宣倜再次重申其謀：

揮手西行慨以慷，雄關百二勢強梁。聲寒易水心彌熱，血濺秦庭氣一張。
客異舞陽容有濟，事同曹劌故非常。披圖何限蒼茫感，豪俠燕邯問在亡。

腹聯「客異舞陽容有濟，事同曹劌故非常」，此次「渡易」，「荆軻」身邊不再是臨陣而懼的秦舞陽，而是一群誓同生死的夥伴，故「和平運動」將能如魯國力士曹沫，逼取「齊桓」，立下盟約，返我故地。尾聯「披圖何限蒼茫感，豪俠燕邯問在亡」，「問在亡」乃反用，是躊躇滿志，即將有行也。詩意接續汪作尾聯「漸離筑繼荆卿劍，博浪椎與人未亡」諸人繼起、共赴之志意，再

60 李宣倜，〈次均精衛先生「題易水送別圖」二首〉，《同聲月刊》2.2(1942.2): 141。

次致意於「還看今朝」的期許。第二首曰：

殿上圖窮劍照霜，秦王環柱走倥傯。酬知授命真人傑，除暴捐軀亦國殤。
有恃崤函終失鹿，無謀趙魏為驅羊。千秋博浪存韓志，一樣爭光日月長。

腹聯「有恃崤函終失鹿，無謀趙魏為驅羊」，前句指重慶偏安困守之政策，後句批評聯共政策，蓋汪精衛遺書〈最後之心情〉有：「回憶民國二十七年時，歐戰局勢，一蹶千里，遠東成日本獨霸之局，各國袖手，以陳舊飛機助我者唯一蘇俄。推求其故，無非欲我苦撐糜爛到底，外以解東方日本之威脅，陰以弱我國本。為蘇計，實計之得。為中國計，詎能供人犧牲至此，而不自圖保存保全之道？捨忍痛言和莫若」可證。⁶¹ 尾聯「千秋博浪存韓志」之存韓，指張良博浪之擊乃為復興韓國，而「『一樣』爭光日月長」，則指汪詩「生慚鄭國延韓命」之鄭國與張良一樣，都是存韓之志。此聯暗示「張良行刺」與「鄭國作間」都是為國為民的存韓之心。李宣倜明白汪精衛的心意之餘，仍不忘再次進諫「博浪之擊」的立場。李詩步汪韻，同時振起，有景有情，和而不同，仿若對話。（當然，汪「率爾長歌」，以詩和詞，東扯西拉，脫離「易水送別」的題旨，李宣倜的和詩只有繼續追上汪氏詩意，再闡己志。）

前維新政府行政院院長、時任汪政府監察院院長梁鴻志亦有七絕四首，惟其純詠「易水送別」與當日處境，未針對汪精衛庚戌蒙難之形象而和，與諸人之作甚異。自然，從梁北洋安福系的身分，與維新政府被汪政權併納的緣故，梁或許對汪精衛有些不滿。⁶² 考梁鴻志題詩之日，張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已成，依張江裁請序者之衆之廣且各俱相當之文才與身分而論，梁自當身與其中，但庚戌蒙難實錄相關序跋，竟無梁鴻志之文。此正可解釋為何梁並不附和畫作上汪之「舊題」。而梁的身分和作意與以上諸作不同，正可對觀也。詩題〈為援道題「易水送別圖」〉，計四首，其云：「腐遷史筆久傳神，不及丹青為寫真。今日圖窮無匕首，眼中何限虎狼秦（其一）」、「真堪立懦與廉頑，變徵聲中去不還。刺客國殤休等視，怕人孤注擲江山（其二）」、

61 收於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頁 1016-1022。

62 楊凡譯，「汪精衛與梁鴻志會談內容」（1939），日本外交檔案 sp157 號，收於黃美貞等編，《汪偽政權資料選編：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 142-144。

「自是荊軻劍術疎，虛捐樊首督亢圖。輸他劉季提三尺，臣服燕秦罵豎儒（其三）」、「神勇方能致太平，期君此事學荊卿。田光老矣無人問，夜誦陰符坐到明（其四）」。⁶³

第一首「今日圖窮無匕首，眼中何限虎狼秦」，點出「今日」實亦刺客也。只是「無匕首」，正淪陷區、「偽政權」之苦境。好不容易獻首納圖、犧牲一切、親近秦皇之際，卻圖窮無匕首，「何限虎狼秦」，一切頹然。第二首結尾「刺客國殤休等視，怕人孤注擲江山」，承認「無匕首的刺客」之初衷與自我犧牲，功不可沒，同時亦致恨於重慶國民政府拉長戰線的焦土戰略。

第三首回到歷來文人談論荊軻的典範，批評荊軻有勇無謀、不習劍術。如前引李宣倜詞「且休笑、荊卿謀拙」、「功就定誇曹沫勇，身亡未讓專諸烈」，也是傳統文人談論荊軻的固定視角，但其中差異在於宣倜持正面立場迴護，梁詩卻直為批評。此句夾諷帶罵，在眾人俱以荊軻優許汪精衛之際，梁卻偏為批評，與其身分不能無關。

第四首意有所指，分涉自己與任援道。「神勇」，典出《燕丹子》：「田光答（燕太子丹）云：『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⁶⁴重點就在「怒而色不變」，梁鴻志以此心法傳授任援道，或深有得於與日軍閥相處之道。最後自歎衰老卻持有兵法心訣，以不見用、不見聽而自憐自艾。值得注意的是，為何汪精衛與梁鴻志都有此際匕首不可出（或出而無益）的類似想法呢？這或與梁、汪兩人都曾是「偽政權」領導人物之經驗相關，當再另文研究。

不同於和詩諸人，《同聲月刊》主編龍榆生，自創「〈易水送別〉歷史歌劇」一體，將眾人詩意涵括入劇。戲劇較諸詩詞，更具宣傳的功能與意味，龍氏所以總括諸人詩詞並添己意者，當是自認已受汪精衛肯認。

該劇前言誌語以「此劇取材於史記刺客列傳。……劇中歌詞，或襲用詞曲舊調，或率意為長短句，自創新名，將倩新興樂家，為製新譜。作者不解

63 梁鴻志，〈為援道題「易水送別圖」〉，《同聲月刊》2.2(1942.2): 140。

64 清·孫星衍輯，《燕丹子》（《續修四庫叢書》第 126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中，頁 2。

西洋歌劇，但雜採唐宋大曲，及金元散套雜劇之遺式，而變化出之。命曰『四不像體』」序其始末，⁶⁵ 囊括陶淵明〈詠荊軻〉、汪精衛詩、李宣倜詞等。而且，諸幕開場詩詞與劇中各角之詠歎宣敘，或都變化自汪等人的詩意與詞意。本劇固由龍榆生一手寫成，然而劇中諸詩詞，皆取材於當日的題詠。龍榆生所以念念不忘，蓋寓深意矣。

總言之，自汪等「易水送別圖」題詠相關文本中，可揭櫫特殊時空當中之「漢奸」諸人的思考與心理狀態：掌握「京畿」兵權（蘇浙皖）且已與重慶政府所派策反特工任西萍聯絡上的任援道出圖請詩，而此圖乃曾向汪精衛囑託後事的老友高奇峰所作「易水送別圖」，其時係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不滿兩個月，以身分與實力論，任儼然兵諫，然而他只出圖並示以舊題新詞，存心亦可謂委婉；再者，自許汪精衛詩詞知己的龍榆生率先陳詞，以情進言，一宣抑鬱難伸之苦，欲以動搖汪；最後，文官身分（印鑄局局長）同時亦有軍事背景的李宣倜假荊軻之謀借箸劃策，此蓋以理說之也。由此可見，任援道挾據兵勢、龍榆生動之以情、李宣倜援史說理，三人用心不可謂不深。

再者，也可見文人寄託諷喻的運用：龍榆生突出荊軻深受委屈卻毅然為之的心情起興，在歷來歌詠荊軻的系譜中，不但獨樹一幟且入情入理；李宣倜排落宋人的詆毀，析理出荊軻諸人從使秦、挾秦到刺秦的謀略與貢獻，最後建議汪精衛展圖出劍；而梁鴻志卻以此際「圖窮無匕首」，故需「怒而色不變」以勉任援道，暗諷汪精衛。

汪精衛固知道自己成名於庚戌行刺，亦明白此際眾人以荊軻之任屬我，然而，歷史一去不能復返，汪精衛不但明白如斯，也知道歷史時機點上，自己應當有所為（和平運動）與有所不為（此時的「行刺」）的信念。汪的決定，正見其所以迥異於刺客列傳諸人。蓋刺客酬知己、報恩仇、不顧死生，但求立名於天地足矣。汪精衛則以為乃若於國於黨有利，身且可滅，名亦可毀。故他以「鄭國」心事、「鎔釜」自期，相對於當年庚戌行刺與此際眾人期許，汪精衛現在的烈士情結，是以「鑄金城」的謀略與「延韓命」的心情而展現。

只是，古來求仁，未必得仁，原心又能否略跡呢？

65 龍榆生，〈易水送別歷史歌劇〉，《同聲月刊》2.3(1942.3): 91-101。以下引用該劇，不再出註。

五、結 論

本文認為，從汪文人在「和平運動」期間標舉汪精衛庚戌行刺，又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題詠荊軻，其寄意與文學表現，正可資理解他們於斯時的所感與所為。他們假荊軻故事發揮的文學技巧與詮釋進路，使讀者仿若親臨戰國趙亡燕危的孔亟局勢，甚者，較諸歷來文人的荊軻詮釋，他們的詮釋細緻地析理荊軻故事中「使秦」、「挾秦」、「刺秦」的過程與立場，且更同心同理地呈現荊軻一行人從易水送別到圖窮匕現過程中的幽微心理發展。

所以如此，與斯時斯境不能無關。試為董理荊軻一行人赴秦行刺過程中的三階段以比擬汪政權之成立，則汪精衛呼應近衛聲明，與日各部會首長相談暨成立南京政府，可謂「願舉國為內臣」的「使秦」行為。而李宣侗等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所進諫的「客異舞陽容有濟」之謀，則為最後的「刺秦」之策。如果說編纂《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是為了建構汪精衛勇於犧牲的形象，則此際假題詠而進諫言，則是比附荊軻刺秦，要汪精衛重新思考對日政策了。

惟汪政權並未走向「刺秦」，蓋汪等還是決定，談判桌上的交涉、溝通，才是正途。從時局看，日美開戰，汪政權似將能拿到更多談判籌碼，而外交場合的周旋、角力，本是其原始初衷；從現實情勢看，荊軻使秦乃孤絕一行人，而汪等身赴淪陷區，底下百姓官吏俱在，豈便一刺即走、就義求名？故在「使秦」與「刺秦」中間，汪精衛的策略更似「挾秦」，欲籌碼交換而不血刃也。

以上蓋以策略言。至若「挾秦」之計下的情感脈絡，則龍榆生所揭舉「易水送別到圖窮匕現」之備受誤解的委屈，與汪精衛所呼應的「延韓命」之苦楚、「鎔釜鑄城」之自毀、變形與決心，李宣侗所細析的刺秦上下策，俱見汪等人於當時的壓抑與堅持。葉嘉瑩曾用「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以論汪精衛晚年詞之特色，從本文所解析汪氏二詩，正見汪精衛的烈士情結，在此特殊時空、自身經歷與荊軻故事的互文中展現困挫而不後悔、堅持而非衝動的志意與信念。

龍榆生曾於 1941 年論「主寄託說」之常州詞派與「世變」的關係，他說：

嘗怪常州詞派，獨標宗旨，議論精闢，為倚聲家開無數法門，而張、周二氏所為詞，似不足與其言相副，久乃益信吾所持「至情之激發，有關世運，不可力強而致」，為顛撲不破之說。所可學而能者，技術詞藻，其不可學而能者，所謂詞心也。詞心之養成，必其性情之特至，而又飽經世變，舉可驚可泣之事以醞釀之，所謂「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者，止庵能言之，而所作恆未能相稱，則亦時為之也。⁶⁶

該文與「『易水送別圖』題詠」相距不到一年（且都作於汪政權時期），龍氏捨我其誰之意，躍然紙上。對於身處汪政權的龍榆生而言，常派寄託說之應用，正表現在難以進入政治或道德正確敘述框架裡的內容。此不但為常派進一解，更與詞體幽微要眇、幽咽怨斷的特質相符，甚至比諸「詩史」，帶出「詞史」的特殊意義。或者，「荊軻心事」、「鄭國行事」，那些正史雅不願見，欲以「盜」書、以「漢奸」名者，恰可透過常派的寄託技巧，傳達並保留其中的幽情微意。而常派寄託說，也正在「汪政權」此一世變中，得到理論與創作的印證，發揮文學駐跡當下的功效與渲染力。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

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宋·蘇轍，《古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7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王應麟著，清·翁元圻等注，樂保群等校點，《困學紀聞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宋·洪興祖著，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清·袁枚著，周本淳標校，《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66 龍榆生，〈晚近詞風之轉變〉，《龍榆生詞學論文集》，頁380。

- 清·孫星衍輯，《燕丹子》，《續修四庫叢書》第 126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影印清乾隆孫氏岱南閣叢書本。
- 《民報》，《中國近代期刊彙刊》第 2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影印本。
- 包清岑編，《抗戰文選》，《民國史料叢刊》第 277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 汪精衛著，陳璧君手抄，龍榆生校跋，《雙照樓詩詞稿》，臺灣：東吳大學圖書館館藏 1945 年陳璧君獄中手抄贈端木愷影印本。
- 汪精衛等編，《高奇峰先生榮哀錄》，《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 88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3。
- 黃美貞等，《汪偽政權資料選編：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張江裁編，《汪精衛先生著述年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99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據 1943 年《拜袁堂叢書》本影印。
- 張江裁編，《汪精衛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99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 張江裁纂輯，《袁督師遺稿遺事彙輯》，《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 24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3，據 1941 年《拜袁堂叢書》本影印。
- 張江裁纂，《汪精衛先生行實錄》，《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 85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3，據 1943 年《拜袁堂叢書》本影印。
- 張江裁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別錄》，《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 85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3。
- 張篁溪編，《汪兆銘庚戌被逮供詞》，《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 58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3，據 1912 年《篁溪雜誌》本影印。
- 陳道量編，《國藝月刊》(1940.1-1942.4)。
- 龍沐勛編，《同聲月刊》(1940.12-1944.11)。
- 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龍榆生，《忍寒詩詞歌詞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 《朱家驊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二、近人論著

- (日)川島真著，田建國譯 2012 《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王克文 2001 《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臺北：國史館。
- 王書輝 2006 〈壯士為何一去不復還——荊軻慷慨赴秦的心理解析〉，《歷史月刊》217(2006.2): 133-135。
- (日)伊原澤周 2003 《從「筆談外交」到「以史為鑑」——中日近代關係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

- 沙先一、張暉 2008 《清詞的傳承與開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汪榮祖 2005 《詩情史意》，臺北：麥田出版社。
- 金雄白 1988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臺北：李敖出版社。
- 唐啟華 2008 〈中國對「二十一條」的抵制：兼論外交史中的「神話」與「史實」〉，收錄於黃寬重等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頁 333-350。
- 唐啟華 2010 《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徐吉村 2005 「地下戰場：戰時重慶國民政府與汪政權的暗鬥」，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頁 185-186。
- 曹伯言整理 2004 《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許育銘 1999 《汪兆銘與國民政府》，臺北：國史館。
- 許育銘 2001 〈汪兆銘革命生涯的崛起〉，《東華人文學報》3(2001.7): 323-346。
- (美)博伊爾(John Hunter Boyle)著，陳體芳等譯 1978 《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 1937-1945》，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
- 葉嘉瑩 1996 〈從艷詞發展之歷史看朱彝尊愛情詞之美學特質〉，葉嘉瑩、陳邦炎著，《清詞名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頁 121-191。
- 葉嘉瑩 2012 〈說汪精衛晚年詞作中的感情心態，兼論詞體之美感特質——從汪精衛一首〈憶舊遊〉詞談起〉，《印刻文學生活》9.2(2012.10): 110-127。
- 葉嘉瑩主講，汪夢川整理 2009 〈汪精衛詩詞中的「精衛情結」〉，《印刻文學生活》5.7(2009.3): 104-117。
- 潘益民 2007 《陳方恪年譜》，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蔡星儀 2002 《高劍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蔡德金 1993 《汪精衛生平紀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羅久蓉 2004 〈中日戰爭時期蔣汪雙簧論述〉，《新史學》15.3(2004.9): 147-201。

Emissary, Duress, and Assassination in the Kingdom of Qin: Wang Ching-wei's Martyr Complex and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Painting "Farewell at Yishui"

Liu Wei-chih*

Abstract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inscriptions added to the painting "Farewell at Yishui" in 1942 by literati serving in Wang Ching-wei's 汪精衛 regime, just as the Pacific War erupted. It explores how Wang Ching-wei and his followers interpret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ory of Jing Ke 荊軻, Wang's 1910 plot to assassinate the prince regent Zaifeng 載灃, and the peace movement through this group of texts. By examining the appropriation of literary allusions, references to political strategy, and sentiment employed in their poetry,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intentions and anxieties of Wang and his literati friends.

When literati imply their ambitions through poetry in a puppet regime, are they still able to fully express themselves or will the metaphors they use be distorted? After WWI, as the volatil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nationalist discourse came into conflict, could Wang's Peace Movement be explained or defended by scholars via the "Theory of Chi-Tuo" of the Lyric School of Changzhou 常州詞派寄託說? Researchers have avoided or neglected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achievements and emotional context of scholars serving in Wang's puppet regime. By shedding light on literary performance and style in that specific atmosphere, I hope that scholars will reassess the value of the poetry written by the literati of the time.

Keywords: Wang Ching-wei 汪精衛, Long Yu-sheng 龍榆生, *Tungsheng Monthly* 同聲月刊, Sino-Japanese War, Jing Ke 荊軻

* Liu Wei-chih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